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1

1993

本刊前主编钱宏研究员逝世……………本 刊 (1)

《近代史研究》的创办——忆钱宏同志……………丁守和 (2)

• 中 日 关 系 史 研 究 •

《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

——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日)伊原泽周 (7)

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

——《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 ……(日)村田雄二郎 (27)

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

——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 ……贺跃夫 (41)

清末在闽日僧与日本驻台“总领事”关系 ……陈小冲 (63)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开端

——读黄骥 ……杨天石 (75)

* * *

20 世纪以往 开拓未来

——在郭沫若诞辰 100 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刘大年 (90)

* * *

鸦片战争期间士民具折上奏问题述论 ……邴永庆 (96)

“变易”与“不易”的二律背反

——洋务派“变法”观刍议……………冯天瑜 (108)

哥伦布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俞旦初 (117)

清末立宪派的民权观……………刘 伟 (130)

论 20 世纪初年的国民思潮 ……张俊霞 (147)

江浙士绅与辛亥革命·····	汪林茂	(163)
清末民初英俄对新疆的侵略·····	刘培华	(183)
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	何一民	(195)
1918—1920 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述论 ·····	李永昌	(211)
问题 四川义和团质疑·····	曹 蓉	(227)
讨论 斯大林没有劝阻过人民解放军过江·····	刘志青	(240)
书评 中国资本主义研究的可贵成果·····	汪敬虞	(251)
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	王学典	(257)
中美关系史丛书新出专著两种·····	陶文钊	(271)

读史札记

魏源《西师》诗考释·····	李 瑚	(272)
----------------	-----	-------

· 动态 · 中华民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	汪朝光	(286)
1988—1989 年台湾、香港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	近代史所图书馆	(289)
本刊启事·····		(318)

本刊前主编钱宏研究员

[本刊讯]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钱宏同志，因1992年9月18日19时30分逝世，终年71岁。

钱宏，原名钱念杞，1921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先后求学于浙江大学史地系、西南联大历史系，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6月进入解放区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随后进入华北大学研究部历史研究室工作。1950年5月随该室集体转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此后一直在本所从事史学研究，先后任近代史组组长、近代政治史研究室主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任、《近代史研究》主编、近代史所学术委员，1986年离休。

钱宏具有渊博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便投身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工作。几十年来，他除了参与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以外，还撰写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等有影响的论著，参加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的编写、定稿工作，以及有关部门交办的学术写作任务。钱宏思想敏锐，学风扎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反复钻研，刻意求精，表现出高度的综合分析能力。

为了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1979年春，近代史研究所决定创办《近代史研究》杂志。作为本刊的创始人和主编之一，钱宏对刊物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劳动。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的办刊方向，组稿、审稿，他都亲自动手，身体力行，工作认真负责，思考周密细致，为保证刊物的质量，使《近代史研究》逐步成为史学界有影响的刊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史研究》的创办

——忆钱宏同志

丁守和

钱宏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友。

我与老钱是在 50 年代认识的，主要是一起开会时见面对谈，没有什么来往，了解不多。

1961 年初，我调近代史所，负责《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当时老钱负责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接近自然多起来。我对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熟悉。编辑部人员又很少，主要是靠黎澍同志拿主意，想办法。编辑部主要是负责组稿、审稿和处理稿件。在具体选题、组稿及物色作者方面，有时也同老钱谈谈，听听他的意见，还请他审阅某些稿件。在这些接触中，我发现他很有思想，有见解，看问题比较深入，对稿件能提出较好的处理意见，对我很有帮助。

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黎澍同志来近代史所后曾提出希望大家多读些书，并具体开列了阅读马列著作书目，也勉励大家多读些历史书籍，把专业搞好。有人在黑板报上不指名地批评“忘了一个红字”，意思是说黎澍只强调专，未强调红。此事我曾同老钱交换过意见。他认为有些人就是只讲所谓“红”，实际是讲空话，不重视专业研究，自己搞不出东西，也不愿让别人搞。他还谈到前些年丁名楠等人写了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有人提出这样的题目就错误，这是把帝国主义作主体，应该以我们为主体，写“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史”，认为这是立场问题。我说出了一卷，后

面是否还要写。他说已经被当作“白旗”拔掉了。谈话之间，是很不以为然的。我听了很感惊奇，也感到他认识问题的正确，有见解，为人正直，敢谈看法。我也同他谈到《历史研究》发表范老的反对放空炮、宁可的论历史主义、蔡美彪的农民战争等文章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发表这些文章很不错，可以讨论，还说黎澍很有眼光。

1979年春，所里决定，为推动全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准备出版《近代史研究》杂志。开始提出有三人主持其事，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在《历史研究》工作多年，且回来不久，想搞些研究，不愿再搞编辑工作，开会时讲了自己的意见。过了些时间，刘大年同志找钱宏和我谈话，说《近代史研究》要办，所里研究由你们二位任主编，希望下半年能出版，怎么办，出季刊还是双月刊，你们考虑。我又申述自己的意见。大年同志说就是你们二位吧，不要再说了，你们先提个具体意见。老钱也劝我不必再说，我们一起做吧，我也不便再说什么，就这样定了。

关于办刊方针和编辑部人员问题，老钱同我商谈过几次。关于办刊方针，当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双百方针。这自无疑义。我们还谈到，这是个专业性学术刊物，要重视学术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性。也谈到这是近代史所办的全国性近代史研究刊物，不是所刊，要在全中国征稿，刊物由主编负责，所里不要干预等。这些所里都同意。当时仅有两位编辑，对史学界也不熟悉，为了尽快开展工作，还建议由研究室各抽一人为兼职编辑，并提出名单，所里同意。编辑部很快组织起来，并同大家一起商量。老钱说明所领导的意见、办刊方针等情况，希望大家多出主意，想办法，把刊物搞好，特别要开个好头。我谈到先抓好第1、2期的稿件，看来要从所里多找到稿子，各编辑也要从北京和外地找熟人组稿。大家提了些意见，并确定先出季刊，以后看情况再改双月刊。对开本、字数也提出意见，并经刘大年同意。

在考虑创刊号的稿件时，自然想到近代史研究的名家，打出他们的旗号，以便引起重视。于是从胡绳、刘大年、黎澍那里要来文

章,而且也确有意思。当时唐 棣华同志拿来彭德怀元帅 1962 年的八万言上书,我看后觉得很好,便想从中选录有关革命史的两部分发表,同老钱商量,他很同意,并将选出的看过。我们便加了“往事回忆”标题,放在创刊号的第一篇。出版后反映很好,也有朋友告诉我标题就用“往事”即可,加上“回忆”就重复了。我同老钱谈起此事,他说当然仔细想想,也是有些重复。我说这也是我考虑不周,缺乏推敲,看来修辞学还得下点功夫。由此我想到以后还可以发表些类似的稿件。所以又相继发表了周恩来、朱德、瞿秋白、蔡和森、董必武、贺龙、陈毅、王若飞、黄克诚及萧克等过去未发表过的文献或回忆录等,很受欢迎,这也是《近代史研究》初办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考虑第 1 期的稿件时,老钱还提出,“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史学界也是重灾区,“四人帮”搞了不少错误和荒谬的说法,应该批判澄清,并建议我写篇文章。我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主要是违背唯物史观,破坏了实事求是和科学性。写文章事我找其他同志商量商量看。他说你还是抽时间写吧!我当时还有其他事,便同另位同志商量写一篇《实事求是和历史科学》,谈些具体意见,请他写了个初稿,我作了修改,请老钱等看过,他们提了意见,我又作修改,便发稿了。1979 年是建国 30 周年,老钱又要我写篇有关的文章,我与另位同志又写了《论我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一文,老钱看后作了某些修改就发稿了。因为第 1 期我们已发一篇,这次便改了个笔名发表。其他有些文章也是老钱出题目请人作的。

在《近代史研究》工作中,老钱和我也有个分工,即有关“五四”前的组稿、审稿由他负责,“五四”后的我负责,每期发表的稿件字数约各占一半。因为我还兼文化室的工作,自己又想搞研究,便提出编辑部的工作全由他负责,我主要是看些稿子,在组稿审稿方面提些意见。按规定每期稿件的最后校样,主编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并签字后才能付印。“文革”前《历史研究》的最后校样是到印刷厂

核对,《近代史研究》虽不下厂,但主编仍要看一遍。按理“五四”后部分我应看一遍校样的,而我却“偷懒”了,都推给老钱。老钱也给我以鼓励,多搞些研究,足见他对我的谅解和理解。

在我与老钱的长期接触和共同工作中,我觉得老钱对中国近代史是很有研究的,资料熟悉,有见解、有看法,思想敏锐,有分析能力,文字也清楚简洁。他在50年代中写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至今看来也是一篇好论文。以后因长期忙于(或陷于)中国近代史稿的大书,花了很多时间,费了很多精力,就很少写文章了。有时谈起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集中很多人写一部多卷本的大书,不一定是好办法。我也有这样看法。我们的意见大概是,如果主编实际负责,按他的意见写,人多很难做到,改起来也实在困难,加以主编一般是领导,事多,结果只有拖时间;如果主编是挂名的,或只是看看稿子,作点文字修改,那写出来的也可能前后不一、文风不一,究竟怎样做好,还值得研究。但是他并无怨言,反而责备自己。有时我也提出他应该写些文章。他曾几次谈到,由于长期搞大书,没有写文章,别人不来找(即不来组稿,没有压力),自己也就手懒了,不想再写什么。他希望我多写些东西,编辑部的事他多负责。他的好意我自然理解,而他流露出的自责之意,反映了他的开阔胸怀。

办好刊物除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外,主要是组稿和审稿问题。编辑组稿一定要尽量物色确实对某些问题或事件人物等有研究的作者,能写出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审稿要能提出有助于作者改进和提高论文质量的意见。老钱对这两方面都很重视。他既要大家善于组稿,自己也亲自到北大哲学系老同学那里组稿。他看稿很仔细,甚至对稿中的引文也要找原书来核对,发现有错,就提醒责任编辑改正,并对作者提出校正意见。有一次发表一篇有关汪精卫在武汉时期的文章,编辑看后,我也看过,并同意发表。老钱在最后看校样时,发现有一处提法似不妥,他要我看看,我同意他的意见,并商量作了修改,可见他很认真,而我有时却大而化之,仔细推敲

不够。有时稿源较少,我曾提出现在研究生多,博士生硕士生都有毕业论文,应该从这方面选发些文章。我认为,总的说当然导师知识多、水平高,但就某一问题,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功夫,无论阅读的资料或考虑问题的深度,可能会超过导师的。因此应注意近现代史方面的学位论文,合适的可请作者作些压缩后发表。老钱很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也是培植新生力量,并要大家多注意和了解这个渠道的情况。

老钱工作上认真负责,也善于团结同志,能正确处理同志间的不同意见。编辑部原来各室兼职的同志多,主要是大家分工看稿子,有时开开会。以后主要是专职的了,有编辑,有校对和负责登记与退稿的等,大家在一起,难免有不同意见或矛盾。这方面都是老钱管,我是很少过问的。我住的较远,一般每周到所里两次,老钱每天到所里,所以编辑部的事实际上都是他处理的。有些事他同我谈谈,尤其职称问题他很谨慎。他到我家来过几次,我也到他家去过,商量些问题。他担任党委委员,有些情况也同我谈谈。我觉得他考虑问题周到,处理问题慎重、公允,具有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近代史研究》的创办,并不断改进,是与老钱的认真负责和努力分不开的。

钱宏同志离开我们了,在《近代史研究》工作过的同志都很怀念他!

《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

——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

(日)伊原泽周

前 言

值此中日两国复交二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来谈谈百余年前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上做出极大贡献的黄遵宪,这或者是很有意义的。

迄至今日,对黄之研究及有关于黄之著书甚多。例如:钱萼孙的《人境庐诗草笺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社修订版),麦若鹏的《黄遵宪传》(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社出版),这两本书对研究黄遵宪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当时钱、麦二人未能见到日本方面有关黄遵宪的文献。

1946年(昭和39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编辑的《大河内文书》由平凡社出版,将1877年(明治10年)至1881年(明治14年),黄遵宪与日友大河内辉声(号桂阁,因祖先是松平信纲,即源氏,故又称源桂阁)的笔谈残稿译为日文,介绍于学界。由于不懂日文者甚难使用该书,故实藤与新加坡学人郑子瑜共同合作,将残稿原文加以整理与校订,于1968年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为题,由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该书刊印后,引起不少

中国学人的注意。吴天任根据遗稿史料撰《黄公度先生传稿》(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接着,1979年杨天石的《黄遵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郑海麟的《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出版)都大量地使用遗稿。

黄遵宪是一位诗人,通过“诗”,他与日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黄遵宪的第一本著作是《日本杂事诗》。该诗集于1879年完成,遂呈送北京总理衙门,由总署于这年七月以同文馆聚珍板刊行。

《日本杂事诗》于1943年(昭和18年)由实藤惠秀、丰田穰共同译为日文,由东京生活社出版。1968年(昭和43年),实藤、丰田将原译本加以修正、补译(如关于日本国体及皇室的诗句,在1943年因避讳而未能译出),由平凡社出版。日译杂事诗,另加小注释,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少的参考。1981年,钟叔河辑校的《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是中国目前校注最完善的版本。

本文不是研究《日本杂事诗》,而是探讨1877年冬黄遵宪初次抵达日本后,直至1882年春离日赴美时止,在这近五年的岁月中,他是怎样以其诗文与日本人交往,通过诗文,又怎样地开始撰写他的名著《日本国志》,以完成他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使命。

一 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的形成

1877年,黄遵宪以驻日公使馆参赞的身份初抵日本。他是科班出身的知识人,他的诗“能容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颇合一般人的口味,故黄遵宪到了日本以后,通过诗文与日本各界人士交游。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士土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贄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第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①他所交结

^① 《日本杂事诗》王韬序。

的日本友人甚多。例如：当时明治政府中的要员，参议伊藤博文（春亩），海军卿榎本武扬（梁川），陆军卿大山岩，著名汉学家重野安绎（成斋），冈千仞（鹿门），青山延寿（铁枪），加藤樱老（伯敬）等，此外还有秋月种树（古香），宫本小一（鸭北），宫岛诚一郎（栗香），石川鸿斋（英），小野湖山（长愿），鲈亢邦（彦之），龟谷省轩（行），蒲生重章（子暗），岩谷修（六一），穴户玠，以及大和内辉声等。而大河内辉声是黄遵宪最亲密的朋友，往来最频繁，无事不谈，他们通过诗文及笔话，把彼此所见所闻的一切及其感想都赤裸裸地写了出来。这为黄遵宪撰写《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实藤惠秀在日译《日本杂事诗》的〈解说〉里，这样地指出：“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犹如兄弟一般，就其份量而言，日本国志四十卷，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应为大哥哥。从刊行的先后而言，原本日本杂事诗是日本国志的大哥哥，而定本日本杂事诗则为日本国志的小弟弟。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可以说是著者脑中同时诞生的双生子。^①此言颇有道理。我们或者更可以说：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是母子的关系。前者是母而后者是子。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黄遵宪是位诗人，他每天似乎要吟几首诗以作消遣。他所吟的诗非中国一般的风花雪月的抒情诗，而是将异国日本的文化、思想、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一切都反映在他的诗句里。因此，他的日本杂事诗如不加注释，绝非一般中国人所能理解。这么说来，他的“注”则在成“诗”之后。而“注”只能简短地说明，不能长篇大作。所以他常常在诗的注释里指出：详情见日本国志某某志。换言之，他是先吟诗，后加注，最后把“注”加以扩大与整理而成为“志”。因此，日本国志是由日本杂事诗初稿成长出来的，日本杂事诗初稿是日本国志之母。

① 实藤惠秀、丰田穰译《日本杂事诗》第319页（平凡社，昭和43年，东京）。

今将日本杂事诗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两部作品的版本及联系

如上所述,日本杂事诗初稿于1879年完成。这年七月,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板刊行,是黄遵宪最早的处女作。这年九月,大河内辉声在“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碑阴志上写道:黄遵宪“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著日本杂事诗百余首。一日过访,携稿出示,余披诵之,每七绝一首,括记一事,后系以注,考记详核,上自国俗遗风,下至民情琐事,无不编入咏歌,盖较江户繁昌志,扶桑见闻记,尤加详焉。而出自异邦人之载笔,不更有难哉?余爱之甚,乞藏其稿于家。”^①(下略)题志的最后,有“明治己卯九月桂阁氏撰并书”数字。明治己卯,即明治12年(1879年)。

恰巧1879年4月,王韬(紫诠)应日本“报知社”栗本勘云之邀,由沪来日。抵东京后,王韬于5月17日访何如璋公使,始在公使馆与黄遵宪晤面。此后二人结为诗友。王韬滞日数月,这年八月下旬离日返国时,黄遵宪将日本杂事诗稿示王,“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②因此,王韬把诗稿携回,在香港循环报馆付印,有“光绪五年季冬天南遁窟活字版印行”字样,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天南遁窟活字版”日本杂事诗。

当时,日本东京神田区小川町出版商早乙女要作,根据天南遁窟活字版翻刻《日本杂事诗》,于1880年(明治13年)5月25日刊行出售,并由饭岛有年将诗及注施以训点,以便一般日本人购读。

这154首原本杂事诗,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黄遵宪在英伦公使馆时才把它加以改订,删去7首,另加53首,而且,原本的

^① 同上,附有碑阴志照片,清晰可读。碑面“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数字为黄遵宪之笔。

^② 《日本杂事诗》王韬序。

诗句及注释也有修正之处。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湖南长沙富文堂重刊改订后的杂事诗,称为定本《日本杂事诗》,计二卷。卷一79首,卷二121首。今日所流传者,多是这订本杂事诗。

由上揭之早乙女要作翻刻的154首原本诗,我们可以按照诗之内容及诗的注释分为12类如下:

(一)立国类,(二)邻邦类,(三)天文类,(四)地理类,(五)政治类,(六)财政类,(七)兵制类,(八)法律类,(九)学术类,(十)风俗类,(十一)工艺类,(十二)物产类。

由上揭12类看来,与1890年初刊于广州富文斋的《日本国志》构成内容,大致是一致的。日本国志由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计12志40卷构成。原本154首诗的注释,后经修正,增减,几乎都被日本国志所吸收。例如前揭原本诗第三首《神话古史》的注释中,有“鸕鷀草葺不合尊,尊生神武”之句。在《日本国志》卷一,国统志一则书为“鸕鷀草葺不合尊,尊生日本盘余彦尊,是为神武天皇”。此即其一例也。

《日本国志》虽于1890年初刊于广州,但实际上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夏已脱稿。黄遵宪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朝夕编辑,甫创稿本,复奉命充美国总领事官,政务靡密,无暇卒业,盖几几乎中辍矣。(中略)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篋,重事编纂,又几阅两载,而后书成。”由此可知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始于“居东二年”,即原本《日本杂事诗》脱稿之年(1879年夏),而且,与日本“士大夫交游”,得到了他们的协助,例如参考资料的提供,意见的征询。关于这些记事常见于他们的笔谈遗稿中。

三 与日本友人的笔谈遗稿

前述早稻田大学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是一份欠缺不完全的笔谈遗稿，收录 1878 年（戊寅光绪四年，明治 11 年）至 1880 年（庚辰光绪六年，明治 13 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笔谈记录）。

笔谈的中心人物，中国方面除黄遵宪外，尚有公使馆中的何如璋，沈文荧等人。日本方面除大和内辉声外，尚有石川鸿斋、青山延寿、加藤樱老、龟谷省轩、冈千仞等。笔谈的内容，上自天文地理、国家大事、社会现象，下至私人生活、男女关系，可以说是无所不谈。实际上，是文人们于闲暇之余，相聚一处的杂谈、聊天或“欢谈”，并无特定的话题。由于涉及的范围太广，内容杂乱，难以统一归纳起来。今仅就与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有关的日本学人及其笔谈内容，摘其要者分 A,B,C,D 数点，节录于下：

（A）时间：戊寅（1878 年）3 月 23 日。

人物：桂阁（大河内辉声）、梅史（沈文荧）、公度（黄遵宪）、青山（青山延寿）、如璋（何如璋）等。

桂阁 青山延寿者，有名士也。他父延年（“于”之误——笔者注）者，鸿儒也，弟希见焉。君如不厌，则请同陪。

梅史 此公适来，弟因请黄公翁引见公使，顷当往，陪同君去可否？

桂阁 现往见亦可。

又 青山君不知弟籍贯爵位，请君幸陈焉。

公度 前辱赐食，感甚！梅花绝好，惜主人以微疾不与。比日既勿药，甚幸。

桂阁 微病大好，故特来谢罪。于梅翁处，忽闻青山君来焉。弟闻此君之名久矣，乃特来此处，复得逢两公使，盖可谓佳会。

公度 青山君以史世家，博洽多闻，品最高雅，不审素识否？

桂阁 何介绍而得来？

公度 有修史馆官岛诚一郎，其同寮也，尝辱敝庐，彼实闻声

而来者，仆辈与之笔话者数矣。（中略）

如璋 阅君前日与公度诸人笔谈，识议甚高，且家传史学著作极富，读所著今只编年，后序，已见一斑，拜服之至！

青山 仆家世业文字，实无识见过人，惟父兄所著书皆以汉文，无一书和文者，是其所以异他人也。鄙人于汉文上下颠倒读之，故语言之间往往有不成语者。大使览阅前有颠倒者，幸指示是祈已。

如璋 君在史馆现编何书，贵国史有各志否？如有成书，乞惠示一观为快。

青山 仆在史馆，搜索史料，是其任也。如撰修则在编修职，今仆所任，辑各藩史料也。大日本史有十一志略已就绪，兵志，刑法志已刻成，其他校合未毕也。

如璋 贵国维新之后，改革纷纭，先置六十余府县，顷定三府三十五县，封域已尽否？又近日兵刑各大政如何？所改定者有编辑成书者乎？愿阅其略。

青山 如日本史志表，读感旧篇中，丰田天功墓铭，其详可得而知矣。在贵国则所论周当尔；在吾邦，自有正史在；舍正史猥论之，实不知国体也。

如璋 君所谓“国体”二字极为斟酌允当，即此足征君之才学，史馆之职，群胜其任矣。

青山 仆固无一长，至三长则谈何容易？

如璋 山阳史笔极有生气，识议亦高；山阳之前，当以何人为称首？

青山 山阳之前有新井白石者，德川氏一代伟人，其论大率以和文，如日本史论赞，亦在吾邦，则世之所称。外史之前，有逸史者，记德川之事可见；且各议论，则醇中儒者也，不似山阳纵横紫论矣。

如璋 山阳议论虽纵横，然其谓贵国武门之祸，源于沿袭唐风，致朝廷之上，仪文繁琐，上下隔绝，其弊至于积弱

不振。其言深切。其他所论，不坠一编。今时若得山阳者维持之，邦国之政，尚必有可观者。卓见以为然否？

青山 山阳吾邦苏宗也，其论犹老苏之于宋也。仆近于经世之事不用意，受贵问不详其细；唯使君若欲成书，是等书已有绪者，若欲求之，当为周旋；仆唯煇文字，更不置于意也。

如璋 赖山阳日本政纪云：“神武以下十代，荒远难稽。崇神之世，始稍具立国规模”。考其时约在汉之中叶，距徐君房来，为日已久。贵国传国宝曰镜、剑，玺，皆周秦之物也。大约贵国人由中土流寓者，未知是否？

公度 自史馆散直后，在家何以消遣？尤爱读何书？

青山 散直后以读书消遣，唯仆性鄙野，日从尘事，未能专心于书也。

公度 时还读书，固仰高雅，然古来旷逸之士，皆不事生产，君得无然？

青山 不事生产，是真所愿，徒有其志，未能脱俗也。

公度 何以为生涯？史馆之俸，能赡一家耶？

青山 史馆之俸，大足为生涯。仆前在东京府，俸倍今日，以故得起松风楼也。（下略）^①

由上揭笔谈，可以看出何如璋、黄遵宪对日本的历史，不但甚为关切，而且深感兴趣。特别是黄遵宪结交了大汉学家青山延寿，对黄编纂《日本国志》，实有不少的建言与协助。

青山延寿(1820—1906)，字季卿，号铁枪，水户藩士，著名汉学家。其父延于，是“水户学”的一代学者。继其父志，致力汉学，造诣极高。1872年(明治5年)至东京，供职维新政府，编修史籍，数年后辞职返乡。著有《读史杂咏》，《读史偶笔》，《皇朝金鉴》，《大日本史地理志稿》及《铁枪斋文集》等。黄遵宪所交的日本友人中，对

^① 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0—33页，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1968年，东京。